

◆ 流年碎影

风中的野菊花

李蒋根

距离2004年春节还有十四天,有着48年历史的县政府招待所从此在县直单位名单上消失了,我的在编职工的身份也一并成了历史。

手里攥着三万五千元下岗安置费存折,一个人静静地呆在办公室。空荡的办公室里,只剩我和窗台上那盆野菊花。菊花的残瓣紧闭,在寒风中蜷缩着身躯。残阳从窗户照射到两片叶子上,叶子泛着暗绿,透出一股不畏严寒的坚韧。

这棵野菊花是两年前春游时在山上岩缝里捡的。我回单位后把它栽进一个闲置的塑料盆,置于窗台。经小心伺候,它竟扎下根,活了下来。离开办公室时,我带上了它,连同几本书、一把算盘和一个印有“先进工作者”的陶瓷茶杯。

回到空荡荡的家,窗外是邻居们置办年货的热闹,我的心里一片迷茫。

被我放在阳台上的那盆野菊花好像通人性,阳光好的时候,它的叶子会微微舒展,阴雨天则蜷缩起来。

年初八一过,我怀揣各种证书不断地跑人才市场,递出去的简历和证书,绝大多数没有音讯。

中午的太阳斜射到阳台上,暖洋洋的,我坐在旁边,盯着野菊花发呆,它不也是无人关注的一株野花吗?可它硬是在石缝里扎下了根。我为什么没有那种精神呢?一个想法在心头闪过:创业!

妻子选择了支持:“要么成功,要么重来。”我迅速行动。多方考察后,选择了包装行业,但因资金所限,我决定从“销售员”干起。

翻出那本暗红色的存折,心里盘算着:三万元“创业”,五千元“活着”。次日清晨,我买了黑色行李包,印好名片,取了包装样品。

2004年5月28日,我背上行囊,爬上了朋友运粮去上海的货车,在江苏太仓市的一个路口下了车,找一个廉价旅馆住了下来。

接下来的三个月,我像个不知疲倦的陀螺,穿梭在商店与写字楼之间,

找客户,谈合作。可到头来,手里名片少了大半,订单的影子都没见到,差点想打退堂鼓。

直到九月,转机出现了,张家港一家公司打电话订一批塑料袋。业务很顺利地谈了下来,但由于经验不足,这批货出了质量问题,最终半价处理,本金损失大半,濒临“破产”。所幸,天无绝人之路,之前散出的名片开始见效,我陆陆续续接到了一些新订单。我真汲取上次教训,始终把产品的“质量”二字刻在心里,层层把关,慢慢地赢得了客户的信任,终于有了回头客。

2005年的年初下了一场大雪,江淮大地被装扮得纯净而优雅。此时阳台上的野菊花居然在严寒中爆出了两颗鲜绿的新芽,顶着薄雪倔强地昂着头。

年一过完,天气暖得真快,阳光明媚,到处呈现出一片绿色生机。订单也逐渐多了起来,我对产品质量的要求愈发严苛,特别是我们“研发”了新的配方,解决了彩色无纺布印刷问题,产品在市场上取得不错的效果。我终于办了第一张属于自己的营业执照。阳台上的野菊花仍在绽放,我想着该把它移栽到一个更大的花盆里。

一次偶然机会,经过当年春游时野菊花生长的地方,发现山上石缝间星星点点的黄花迎风摇曳着,比任何盆栽都鲜活。我的那盆野菊花是不是也应该回归大自然呢?

县城后面有一座凤凰山,外形像展翅的凤凰,山上崖壁陡峭,绿树成荫。我把这盆野菊花移栽到了凤凰山上。挖坑时,它的根须已经盘结成了硬块,我小心地掰开。凤凰山的泥土混合着雨后的清气,野菊花的根系一触到山土便舒展开来,仿佛回到了它过去生长的岩缝。

第二年秋天,我再去凤凰山时,风中的野菊花已蔓延成大片,金色波浪翻滚涌动,如繁星洒落人间。那株菊花终于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。而我,也是。



沸腾 张永生 摄

◆ 边走边看

博弈

陆青

流花湖公园的名气并不响亮,她静静地守在城市的一隅,朴素得像深山里一位沉默的老人。

我常在下班后走进这座公园,沿着那条不算宽阔的林荫道缓步前行,两旁千年古榕巍然屹立,根须深沉,枝叶繁盛,树冠铺展如巨伞,遮蔽尘世的喧嚣。我每次经过,总会在盘根错节的树影下驻足,像孩子般好奇,看看大地与根须之间是否又在悄悄上演着什么故事。

一个初夏的傍晚,我漫步在榕树林道中,忽然瞥见前方树根旁有东西微微晃动,放轻脚步,上前蹲下——一幅原生态的搏杀画面猝然映入眼帘:一只小青蛙,死死咬着一只蚯蚓,而那条七八公分长的小生命,顽强地扭动着身体。青蛙执拗得惊人,蚯蚓抗争得令人动容。

我静静望着它们僵持了足足三分钟。最终,青蛙拖着猎物钻进草丛,悄然隐去。世界恢复平静,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——只是,又有一条生命消失了,而另一条生命获得存续的食粮。

我心里忽然有了某种难以言说的感受。走回宿舍时仍在思索:

碳基生命的价值究竟是什么?查阅之后,看到这样的解释:动物生命的意义,在于繁衍与维持生态平衡;人类生命的意义,则首先在于生存,其次在于体验与创造。梭罗曾说:“生命并没有价值,除非你选择并赋予它价值。”

或许,我们一直试图以人类的视角去理解动物的存在,但自然从来无需抽象的哲学,它以最简单也最残酷的方式运作——生存即意义。

蚯蚓的消失成全了青蛙的延续。青蛙的延续,也许又会滋养另一条生命。这是否也是一种互相成全、互相赋予的“价值”?陆地上虎豹奔袭猎物,海河中大小生物相互捕食吞噬……一幕幕永恒重复,却又令人震撼:动物为了活下去,义无反顾,又无比壮烈,留下的生命被赋予继续前行的意义,离开的生命也完成了它的使命,生命的光,往往就在这短暂与无常之间骤然绽放。

我忽然觉得自己其实什么也没弄懂。哲学有无数答案,而自然从来无需答案。

肚子有点饿。突然,很想吃点海鲜。

客人不上桌,大人小孩不能上桌;客人未动筷,大人小孩不能动筷;倒酒、敬酒都有严格的顺序和礼仪。这些细节,都在潜移默化中教会我如何尊重他人,懂得礼数。

六岁时,父亲就带我去私塾读书,还省吃俭用为我做了一件绿色的长大衣。七岁那年冬天,父亲教我打“小九归”,算错了,就磕我的头。母亲在一旁看着心疼,劝父亲好好说,父亲便改变态度让我打“第七归”,我凭借自己的努力,在父亲未教的情况下完成了,父亲当时高兴极了,夸我聪明,那是我最爱听的话。

1975年春,我参加了治理尧渡河之战,吃住在尧渡镇黄姓家里,父亲想到县城看我,乘坐拖拉机途经大陈堰遭遇意外,车子跌入几十米的河中,他摔得头破血流,棉袄棉裤全部湿透,从此,一病不起,于1976年腊月29日与世长辞。

如今,父亲已离开半个多世纪,但他的音容笑貌,依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◆ 儿女情长

父亲百年祭

张治平

父亲没有务农的经验,也缺乏足够的体力,但他有着超乎常人的聪明才智和坚韧不拔的毅力,很快便成了队里种庄稼的能手,连抄田这种技术活也驾轻就熟。白天,他在田间辛勤劳作;夜晚,他忍着蚊虫酷暑,甚至冒着被野兽袭击的危险,去柴坑、康葛、私秦坂看野猪,只为挣得几个工分,让一家人能吃上饱饭。那时,我还小,父亲常常带着我一起去,在那寂静的夜晚,父亲的身影在月光下显得格外高大。

父亲不仅是农活的行家,还学会了木工、桶工,家里的扁担、水桶坏了,他总能自己修好。父亲在我小的时候还为我制作了学步小推车和木

头手枪,小推车前面那两个像鸡头的春米杵,每推一步就上下活动,发出春米的声音。上中学时,父亲特意为我制作的小火桶和木头书箱,更是饱含着对我的爱与期望。

父亲常带着我去亲戚朋友家做客,让我见识世面,学习如何与人交往,学会做人。逢年过节,即便家里穷困潦倒,父亲和母亲也坚持让我们去给亲戚拜年。没有公路,全靠步行,不管路途多么遥远,礼品多么微薄,我们都会每年必去。过年杀猪时,父亲会把肉送到亲戚家,又邀请全村庄的人来吃杀猪饭,对不能到的老年人或是五保户,他会亲自把杀猪汤和烧好的猪肉送上门。在餐桌上,



父亲要是活着,今年正好一百岁。

父亲张正玉,一生横跨旧社会与新中国的转型期。他六岁丧母,七岁丧父,好在有后娘汪金花将他一手带大。

父亲虽坎坷,却凭借自身努力获得高等教育学历。他先后担任过私塾先生、会计,后来选择在家务农。1960年代初,县里选聘干部,父亲在农村优于城市的观念影响下,毅然放弃了到县水利局工作的机会,从此,扎根于土地,用自己并不强壮的身躯扛起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担。